

期待中高考题型改革破局提速

建人建言

●题型改革作为中高考改革的关键支点,其重要性与必要性毋庸置疑:它早已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须答好的“必答题”。



□朱建人

随着中高考的脚步越来越接近,全社会目光再度聚焦到一张张看似普通却牵系着无数家庭命运的试卷上——它们不但是千万学子寒窗苦读的学业“检验单”,更是基础教育改革的“风向标”。

放眼全球,新技术浪潮汹涌而至。传统以知识存储为目标、机械解题为核心的教学与评价模式,早已和当下社会发展、人才培养需求严重脱节。因此,中高考题型改革成为倒逼基础教育从“提分”转向“育人”的关键抓手。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影响,不少课堂陷入“考什么教什么、怎么考怎么练”的怪圈:教师侧重知识点灌输、解题技巧训练,学生埋头刷题、死记硬背,最终沦为“解题机器”。这种模式下,学生习惯被动接收现成知识,缺少独立思考、批判质疑、创新实践的能力。AI的普及,更让“刷题制胜”教育的弊端暴露无遗:AI可以快速检索知识、生成答案、完成基础运算,机械记忆与重复训练的教育价值趋于归零。

因此,近年来国家持续部署深化中高考改革。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为中高考题型改革划定了方向。今年年初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更对题型改革作出了专项部署:“优化试题呈现方式和素材选取,融入科技前沿动态,浸润人文教育元素,加强项目式、探究式的真实情境问题设计,更好考查学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

由此可见,题型改革作为中高考改革的关键支点,其重要性与必要性毋庸置疑:它早已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须答好的“必答题”。

题型改革能否成功,核心取决于两个相互依存的要素:一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力度,二是中高考题型改革的力度。基础教育改革需要中高考题型改革这根“指挥棒”撬动,而中高考题型改革的推进,也离不开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的跟进支撑。对当下而言,中高考题型改革是撬动乃至倒逼中小学课堂发生结构性变革的核心支点;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必须尽快把新的评价导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课堂改革行动,不能抱着“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心态消极应对,更不能对必要的改革非理性抱怨指责。

具体来看,中高考题型改革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尽快跳出“知识复刻”的桎梏,完成“素养导向”的重构,减少记忆类、套路类试题,增加开放性、探究性、情境化的综合试题,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从“知识点考查”转向“能力化测评”;另一方面,改革后的考题依然要立足基础,指向思维品质与实践能力的考查,绝不能沦为无厘头的“偏题”“怪题”“八卦题”。

题型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向基础教育传递清晰稳定的改革信号,让教师、学生和家都明确: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的核心任务,是培育学生的生活力、学习力和创造力,而非教他们只会应付考试。中高考题型改革,看似只是试题形式的变化,实则牵动着教育理念、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方式的深刻变革,它关乎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关乎基础教育的质量,更关乎国家创新人才培养与民族未来发展。

开放虽有“阵痛”,但不必轻言退缩

六理观察

●高校要做到开放有序、共享有度,在开放中完善治理,实现开放与秩序的双赢。



□胡欣红

近日,武汉大学对公众全面开放收获了不少赞誉,但很快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闻情况。

据媒体报道,不少武大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部分游客存在爬树拍照、直播学生上体育课等不文明行为,激增客流还导致校内部分食堂爆满,就餐高峰期本校学生甚至“一座难求”,引发学生不满与舆论热议。

武大全面开放后出现的这些问题,本质是“新鲜感红利”与管理磨合期叠加的阶段性“阵痛”。武大取消预约后的首个周末,恰好撞上高考前毕业班研学热潮,短期客流井喷直接推高就餐压力。爬树拍照、随意直播等不文明行为,并非开放本身的必然结果,更多是“尝鲜者”好奇心集中释放、部分游客规则意识淡薄所致。这类乱象也并非武大独有,此前有游客在浙江大学草坪上吃火锅、四川大学食堂成了大众饭馆,一些高校赏花期也屡屡出现不文明现象,都是公共空间开放初期的共性问题。这些问题看似棘手,实则是开放进程中暴露的管理短板,绝非开放政策本身的错。

开放与秩序不是对立的命题,校园秩序失衡的根源不在开放本身,而在规则缺失与管理缺位。大学本就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其依托公共财政建设,开放校园、共享公共资源是应尽的责任。国内高校曾长期对社会开放,也始终保持着良好秩序,就是最好的证明。如今武大开放后乱象频发,恰恰说明精细化治理没能跟上开放的步伐。这些问题并非无解,更不能成为重回封闭的借口,开放带来的烦恼需要用理性来应对。

真正的治理智慧,从来不是“一禁了之”的简单粗暴,而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在开放中寻

找解法、在磨合中补齐短板。事实上,武大的开放并非无底线放任:禁止社会车辆入校,实验室、学生宿舍保留门禁,教学时段严格管控人员进入,这些已经是精细化治理的初步尝试。后续只要进一步细化游览路线、增设高峰疏导人员、明确不文明行为的惩戒规则,就能逐步消除秩序隐患。换个角度看,武大遭遇的开放“烦恼”,恰恰是推动管理水平精进的契机,没有退回去的道理,更不该成为其他高校封闭校园的借口。

大学“亲民”,也需游客“止于至善”。大学校园开放本就是高校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既需要校方主动担当管理责任,也离不开游客的文明自觉。对高校而言,开放是姿态,管理是责任,不能因短期乱象动摇开放决心,要以问题为导向,借鉴已有经验,平衡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做到开放有序、共享有度,在开放中完善治理,最终实现开放与秩序的双赢。

对公众而言,走进高校是权利,守护校园秩序是责任。大学的核心价值是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环境的清幽、学风的醇厚是师生应享的基本权益。游客赏景打卡之余,要守住文明底线:不攀爬破坏植被,不随意打扰师生,不挤占学生就餐、学习空间。校园不是公园、菜场,唯有尊重规则、敬畏学术,才能真正感受到求学底蕴,并汲取文化养分。

百年武大,以开放姿态,显包容格局。开放本就是大学应有的常态,秩序是开放可持续的保障。短期乱象只是开放路上的小波折,不必恐慌,更不必因噎废食。唯有理性审视、共治共管,才能实现开放与秩序的双向奔赴。也只有拆除有形围墙的同时筑牢无形文明规则之墙,才能让大学真正回归社会,让开放包容成为中国高校最动人的底色。

求智论见

别让学校陷入“防御性管理”泥潭

□陈宏卫

沈奕斐被举报事件中,有个细节值得关注:这名家长此前已举报过孩子的老师,还成功让对方受到处分。或许正是这次“成功追责”,助长了其滥用举报权的底气。

当下不少教育管理者面对举报,往往陷入“重平息、轻事实”的怪圈:为快速化解矛盾、规避舆情风险,不探究原委、不厘清权责,一味对涉事教师简单追责、草率处分。这种粗放式处理方式,让教育陷入“防御性管理”的泥潭。

这种模式看似快速化解矛盾、规避了舆情风险,实则后患无穷:无原则的妥协退让,会形成恶劣的负面导向——只要发起举报,就能倒逼学校妥协、让教师受罚。这不仅会让无数恪尽职守的一线教师寒心,催生“不敢管、不愿管、怕出事”的消极心态,滋生躺平式教学、佛

别让教师从“育人”退向“自保”

□曲直

沈奕斐那句“不是做错了什么,是扛不住了”,道尽了无教有相似遭遇教师的辛酸。

家长对素无交集的人尚且步步紧逼,可以想见,日常授课的一线教师处境只会更难。倘若正常的教育管理都沦为高危行为,势必让教师变得谨小慎微、束手束脚。

恶意举报正从三个维度蚕食教育,逼迫教师从“育人”退向“自保”:

一是风险成本失衡。教师依规处置学生矛盾、公正判定是非,本是职责所在,可一次理性处置,换来的却是漫长调查、反复举证,甚至扛不住压力蒙受处分。清白要自证,委屈要自吞,“不作为”反倒零风险。当认真履职的代价远超过收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成了教师的无奈选择。

二是管理导向偏差。不少学校面对家长

▶新闻回顾 近日,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因一场直播连麦,陷入了持续发酵的教育争议。直播中,对于家长描述的“疑似霸凌”事件,她指出对方存在过度保护的“受害者逻辑”,这一结论引发该家长不满,随后遭受其持续举报两个月。沈奕斐的日常工作严重受扰,坦言“不是做错了什么,是扛不住了”。这句无奈之言,戳中许多一线教师的痛点。当举报从正当监督异化为纠缠工具,受害的不仅是某一位教师或学者,更是整个教育生态。

家长滥用投诉,最终谁来买单?

系式管理,更会持续纵容举报权滥用,让非理性、情绪化甚至恶意举报愈发泛滥。

破解该困局,首先需要教育管理者跳出“防御性管理”的思维桎梏,以开放心态坚持阳光办学,勇于接受监督,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学校应主动搭建家校良性沟通桥梁,常态化开展有效沟通,提前化解误会、消解分歧、凝聚共识,从源头减少非理性举报,而非被动应对、事后补救。

教育管理者更要坚守事实底线、站稳公正立场,摒弃和稀泥式处理。对待举报不能一概而论,需精准甄别性质,清晰划分正当监督与恶意举报的边界:对反映真实问题的合理举报,依规督促整改、规范办学;对反复纠缠的无效举报,及时界定、正向引导;对夹带私人诉求、蓄意构陷的恶意举报,绝不纵容妥协,主动为被冤枉教师澄清正名,必要时依法依规惩戒。

无理举报,不肯站在专业公正立场保护教师,只抱着“尽快平息”的心态,让教师承担全部后果。这本质上传递了错误信号:你的专业判断不重要,家长的满意度才重要。最终,教师学到的不是如何更好育人,而是如何不被举报、不被问责。

三是心理安全感缺失。恶意举报最可怕的不是后果多重,而是其不可预测性。一句合情合理的劝导、一个符合规范的处理,都可能被扣上莫须有的帽子。这种无法防范的风险,让教师始终处于防御状态,长期缺乏安全感,再饱满的教育热情也会被慢慢消磨。

不可否认,举报是家长的合法权利,合理的监督可以约束教师行为、促进教育改进。但当举报沦为无理纠缠的工具,管理方一味妥协让步,本质就是纵容偏激,只会助长“举报就能赢”的歪风。

别让学生被“无菌环境”剥夺成长能力

□李平

这场风波并非个案,正是当下家校生态中家长滥用投诉乱象的缩影。

乱象滋生源于多重深层原因:一是极端护短心态下,家长把孩子当成经不起风雨的“易碎品”,容不得半点委屈挫折;二是升学竞争放大教育焦虑,家长习惯性将孩子的成长问题转嫁给学校与教师;三是投诉零成本、诬告低风险,便捷渠道让家长无需举证担责,动辄以投诉宣泄情绪、逼迫学校妥协;四是不少家长缺乏专业教育认知,不信任教师的专业判断,索性摒弃沟通,选择对立维权。

泛滥的无理投诉,最大受害者其实是学生。校园内的人际摩擦、微小矛盾与挫折,本就是学生学习沟通包容、独立解决问题的成长必修课。可一些家长次次全权兜底、层层施压维权,为孩子打造隔绝一切磨砺的“无菌环境”。长期被过度保护的孩子,其抗挫力、共情力、责任意识不断弱化,容易养成以自我为中心、脆弱怯懦的性格,习惯遇事依赖他人、逃避问题,最终丧失适应集体、直面挫折、承担后果的成长底气。更关键的是,高频恶意投诉让教师陷入“不敢管、不愿管、不能管”的困局,导致校园规则约束力下滑,教育的引导功能缺位,最终阻碍学生长远发展。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与不少地方已出台精准纠偏举措,且落地见效。国家层面,教育部明确要求及时澄清涉师不实举报,严厉打击诬告、污名教师的行为,落实《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厘清教师正当管教的合法边界,杜绝“唯投诉论”。不少地方也在完善治理模式。近日,济南市教育局公开答复了人大代表建议,明确提出学校要承担第一责任,不能简单“牺牲教师换和谐”。此前,贵州明确对诬告教师行为依法追责,同时健全教师权益保护机制;长沙则明确要求“及时澄清不实举报、依规处理诬告行为”。此次复旦大学通过严谨取证核查,公开为教师正名、拒绝舆论裹挟,坚决守护了教育专业尊严。

漫画快评



警惕屏幕“吞噬”童年

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这值得每个家庭深思。短视频带来的即时满足、虚拟互动的单向输出,正在悄然侵蚀孩子的耐心、表达能力和真实社交技能。真正的童年不该被屏幕填满,而应充盈着父母的陪伴、自然的接触与自由的游戏。技术只是工具,不应成为教育的替代品。家长多一点克制,孩子便多一点真实的成长空间。

(邱炯 绘)

一线声音

□何勇海

5月20日,《潮州市青年入乡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向青年抛出了创业“橄榄枝”,也为全国推进青年入乡发展提供了法治样本。

当前,乡村全面振兴深入推进,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智慧农业、乡村文旅、农村电商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早已不只是传统农耕之地,更成为青年干事创业的热土。然而,人口老龄化、人才外流问题突出,“谁来种地、谁来兴村”的难题亟待破解。青年思维活跃、活用新技术、精通新媒体,既能为乡村注入新鲜血液,更能带动人才、资金、技术下乡,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对青年而言,城市就业竞争激烈、发展空间受限,乡村创业门槛更低、前景更广,既可避开拥挤赛道,也能更好实现个人价值。

法治护航,让青年入乡创业更有底气

青年入乡发展,离不开坚实的法治护航。近年来,各地虽出台不少鼓励政策,但普遍存在三大问题:一是政策碎片化、缺乏稳定性,落实打折扣,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二是创业权益保障不足,土地流转纠纷、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频发;三是对新形态、新模式缺乏包容,动辄用老办法、旧规定约束,让不少青年望而却步。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系统性、稳定性的法治保障。青年入乡不能只靠情怀,更要靠制度兜底。这部地方性法规恰恰抓住了痛点难点,从产业引导、就业创业到公共服务、支持保障都作出了明确规定,给予了稳定预期和坚实保障,能消除后顾之忧,让青年安心扎根乡村、放心干事创业。

有了法治保障,更要在落实上下足功夫,让法规真正成为青年入乡发展的“护身符”。一是细化配套政策,避免法规“空转”。各地要结合

实际出台实施细则,明确创业补贴、住房保障、税费减免、金融支持等条款的执行标准、申请流程与责任主体,让青年看得懂、用得上、得实惠。二是优化服务供给,解决青年“急难愁盼”。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建立健全部门协同机制,避免“九龙治水”;加快青年公寓、人才社区建设,改善乡村生活环境;提升乡村教育、医疗服务质量,解决子女就学、家人就医难题,让青年入乡也能有品质生活。三是强化权益保护,严打侵害权益的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克扣补贴、恶意违约、假冒农资等损害青年权益的行为,畅通维权渠道,建立快速响应机制,让青年在权益受侵害时能得到及时救助。

期待各地以此为借鉴,重视青年力量,完善法治保障、细化服务举措,让更多青年愿意入乡、能够留乡、成就于乡,让青春在乡村全面发展的广阔天地中绽放光彩。